

# 品味历史

# 品味教学

历史教学论文集

周百鸣 著



杭州出版社

# 品味历史



# 教学

历史教学论文集

周百鸣 著



杭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味历史,品味教学:历史教学论文集/周百鸣著,一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10  
ISBN 7-80633-834-9

I. 品... II. 周... III. 历史课—教学研究—高中—文集  
IV. G633.5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630 号

### 品味历史 品味教学

——历史教学论文集

周百鸣 著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 310007)

制 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834-9/G·49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向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

周百鸣先生大学毕业二十余年，前十年在教育第一线从事历史教学，后十余年调至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的研究与管理工作。百鸣正当年壮力富，励志于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工作余暇，勤学善悟，笔耕不辍，撰写与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与调研报告，还参加编撰了全国和浙江省的许多种历史教科书及教师教学用书等，积多年之成果，选择了部分文稿汇编成集，定名为《品味历史，品味教学》。付梓之际，拜读选辑，获益匪浅，也品味到历史的价值与史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情趣与艰辛。历史是一门感人的学科，历史教学在培养人、塑造人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现借题发挥，谈点感受，权充作序。

前些年，我参加教育部的专家组，两次赴武汉，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实地考察与评估。在听取华中师大的汇报前，在会议室的电视屏幕显现了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一句语录：“历史是划了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大概是章先生一生治史品味出来对历史、历史学的理解。我深有同感。作为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不断探究是我们的责任，不断地发新是我们的乐趣。书法家陈如吉先生为我挥毫写下“究源发新”的匾额，悬挂在书房里，是我对史学的品味，也是我治史的座右铭。历史，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付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究源发新，使我们的认识走近历史。周百鸣先生就是一代又一代人中的一员。文集中选录的史学研究的一些论文，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广征博引,运用大量史料来说明要探究的问题,并在理论层次上作出分析。他撰写《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一文,根据史籍记载和20世纪70年代,宁波市考古发掘出唐代明州港城的许多遗址遗物,认为明州商港城市兴起于中晚唐。作者进一步探讨明州商港城市为什么能在唐代中晚期兴起,他从港口腹地经济、交通路线、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社会环境等诸方面,广征博引,得出结论是“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科技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因素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明州商港城市在唐代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个结论不仅仅是史实的结语,还提升到了理论思维高度。

历史学是实证科学,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表述历史的能力,不仅是掌握历史、分析历史,更应具备总结历史的能力。总结历史的能力,也是历史思维的扩展,即理论思维。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一文,考订了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34所书院(全国约150多所),阐述书院的功能及其作用,更进一步探究南宋时期浙江书院之所以如此发达的原因,认为“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为适应其经济、文化、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和场所。南宋时期书院在浙江各地的普遍设立及其丰富多彩的教学、研究活动,促进了古代浙江文化教育的发展,活跃了学术空气,造就了大批人才,使浙江的人文之盛位于全国之前茅。”为什么在春秋晚期越国能够最终战胜比它强大的吴国,并且能够争霸中原呢?百鸣分析后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越王勾践的人才政策。于是他写下了《论勾践用人之道》一文,全面阐述了“盛衰存亡,在于用臣;治道万端,要在得贤”(袁康《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越地传第十》)这一知

世明言。“失士者亡，得士者昌”，这是吴越争霸胜败之所在，其经验和教训，足供后世借鉴。

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单纯的记忆性学科。古人早已明白这一点，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古代统治者与治史者都能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当今，我们更应把握住历史学的真谛，历史学是一门修身和认知社会的学科，具有长期的、含蓄的、意识导向型的特点。治史应理清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准确地表述历史概念，探讨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人们获得智慧，得到启迪。以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为己任的历史学科，其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早在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就明确指出：“历史学是认识和阐释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与人类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活动密切相关，具有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功能，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历史教学在普通高中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历史学习，了解历史发展真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探究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自己的责任，把握发展方向，从而提高学生素质。百鸣在《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探讨》一文中，对通过历史教学完善学生素质作了简赅而生动的概括，即“一观两情三感四态”：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形成浓厚的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培养高尚的爱国之情，关爱人类和自然之情；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为国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形成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的科

学态度,尊重、理解多元文明成果的海纳百川的态度,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顺应规律的态度。作者还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途径与方法进行了探索,指出“历史教学中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决非一朝一夕、一招一式之功,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倡导一种不与现实割裂、不与大众割裂的‘活生生’的历史教学,培养人的教学,紧密关切人的生存、生活、发展乃至创造,深刻认识人类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他品味出现代教育功能理应强调教育的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和谐统一。百鸣还将现代教育心理学中有关非智力因素的原理引入历史教学研究,在《略论历史教学中优化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一文中指出:“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能否优化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能否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能否升华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品质,是牵涉到我们教学成败的关键”,并从5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在历史教学中优化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此外,论文集中百鸣对中学历史考试评价及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方面的一些研究论述和心得也颇见功力。教学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教育活动。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只有不断探索、研究和掌握教学过程及其规律,才能使教学过程不断优化,收到最佳效果。

这本论文集的主题为品味历史、品味教学,反映了百鸣多年来对历史教育的思考,也反映出百鸣在史学与教学研究及教科书编撰等方面的成果。期待百鸣再接再厉,成果不断,惠益后人。

金普森

乙酉年中秋于杭州颐景园寓所

## 目 录

<b>第一部分 史学研究</b> .....	1
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	3
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	16
论明末苏州织工暴动的历史地位.....	22
论勾践的用人之道.....	27
论楚汉战争刘胜项败的原因.....	35
漫论中国传统道德.....	43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西传述略.....	55
“吴越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	61
<b>第二部分 教学研究</b> .....	65
略论历史教学中优化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67
高中历史研究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72
高中历史探究性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83
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探索.....	89
学习新大纲 用好高一历史新教材.....	97
学习新课标 树立历史教学新理念.....	101



《历史与社会》教材补充两例·····	109
<b>第三部分 考试评价研究</b> ·····	<b>113</b>
刍议文科综合高考的能力要求和高中历史教学改革·····	115
2002年文综高考对中学政史地教学的启示·····	122
立足基础 稳中有新 关注发展 考查能力·····	127
1996年浙江省高中会考历史学科质量分析·····	133
2000年浙江省高中会考历史学科质量评析·····	140
浙江省2003年高中历史会考改革评析·····	148
高中历史会考答卷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156
<b>附录:历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编撰节选</b> ·····	<b>161</b>
艺术中的历史(教科书)·····	163
艺术中的历史·····	168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	172
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	180
近现代人类的思想理论成就·····	186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的浙江·····	202
<b>后  记</b> ·····	<b>219</b>

第一  
部分

史  
学  
研  
究





## 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

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奉化江与余姚江会合处的甬江两岸,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沿海贸易港。据古史记载,明州一带原为夏禹第五代孙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的封地,称“甬句东”,在夏、商、周三代均为越族活动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sup>〔1〕</sup>,在明州一带正式建立鄞、鄞、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但当时这三县的治所均不在今宁波市主城区内。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晋将刘牢之为了防御当时的孙恩农民起义军,才第一次在“三江口”(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会合处,今宁波市主城区中心)筑城,“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籬,俗称籬墙”<sup>〔2〕</sup>。不过刘牢之所筑之城,只是一座在战争时期匆促建起的比较简陋的单纯军事性城堡,尚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政府在原句章、鄞、鄞三县地置鄞州,设州治于三江口,但只经历短短四年,鄞州又被降为鄞县,隶属越州(州治在今绍兴市),鄞县治所亦迁到四明山麓冲积扇地带的小溪(今鄞州区鄞江桥)。可见在唐初,濒江临海的三江口一带经济开发还很不充分,明州港口城市形成的条件尚不成熟。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宁波一带再次从越州分离出来,正式建立明州,州治仍在小溪。唐中后期,明州三江

〔1〕《资治通鉴》卷二。

〔2〕《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城池)。

口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兴旺、交通畅达、人口众多的商港重镇，唐政府遂于穆宗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复将州治移于三江口，并建起“周回四百二十丈”长的子城（城址在今宁波市区鼓楼周围），以作州署和置州学。到唐末，在刺史黄晟主持下又建起约“周回十八里”长的明州罗城（城址在今宁波市区环城马路一线）<sup>〔1〕</sup>。至此，明州港口城市格局完全形成。20 世纪 70 年代，宁波市曾考古发掘出唐代明州港城的许多遗址遗物：如唐东渡门，乃是唐代明州直通州治的主要大道口，城门外又是通向国际海运码头的咽喉；唐渔浦门，其内侧是州城的后集市区，西南侧为州治所，城门外为姚江南岸水运码头；唐城址文化层中还出土有“乾宁五年六月”的铭砖和“大中二年”铭文青瓷器<sup>〔2〕</sup>。这些都充分证实明州商港城市兴起于中晚唐。那么，为什么明州港口城市能在唐代中晚期兴起？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探析与论述。

### 一 港口腹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港市的兴起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港口经济腹地要有足供贸易输出、交换的大量产品。明州港在唐中期后逐渐完备了这一条件。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载：“初，越人不工机杼，”浙江东道节度使薛兼训乃于大历二年（公元 767 年）开始，“募军中未有（妻）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缕纱妙称江左矣。”<sup>〔3〕</sup>白居易亦曾做诗称赞越地出产的缭绫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异彩奇文相隐

〔1〕《宝庆四明志》卷三《城郭》。

〔2〕林士民《宁波考古新发现》，载 1984 年版《宁波文史资料》第 2 辑。

〔3〕李肇《国史补》卷下。

映,转侧看花花不定”<sup>[1]</sup>,反映了中唐以后越州一带丝织技艺日趋高超。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越州上贡给朝廷的丝织物只有交绫白绫,而“自贞元(公元785—805年)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歌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sup>[2]</sup>。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作为上贡的地方丝绸织物,除了有越州的“宝花、花纱等罗,白编、交绫、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等,还有明州的“吴绫、交梭绫”,杭州的“白编绫、绯绫”,湖州的“御服、鸟服绫、绵绸”,苏州(唐代嘉兴一带属苏州)的“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睦州的“文绫”,婺州、处州的“绵”等<sup>[3]</sup>。这些地区出产的名目繁多的各种丝绸绫绢成为中唐以后明州港的一大贸易货源。

明州、越州一带还是世界上最早烧制出瓷器的地区,今上虞、慈溪、宁波等地都曾发现早期的东汉瓷窑遗址<sup>[4]</sup>。到唐代,中国制瓷业形成了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两大系统,而当时越窑系统青瓷的烧制中心就在上林湖一带(今属慈溪市)。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唐代越窑窑群密布在毗连几十里方圆的林湖、杜湖、白洋湖畔及四周邻县,这些瓷窑的“产品运输大多通过漕运,然后顺江而下,集中到‘三江口’一带,出甬江入东海”<sup>[5]</sup>。唐中期以后,明州、越州的制瓷业不但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且产品质量也极佳。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指出:“(瓷)碗越州上,鼎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1977年上林湖畔出土一件晚唐越瓷罐形墓志,墓志

[1] 《白居易逸集·诗选·赠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

[3]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

[4]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 林士民《试谈越窑青瓷的外销》,载《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辑,(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铭中刻记墓主人“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证实当时上林湖一带已设置了烧制进贡品的“贡窑”<sup>〔1〕</sup>，而贡窑出产的一种精品就是被唐末陆龟蒙称赞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越瓷”。当时这些贡窑产品除部分上贡朝廷外，其余部分亦往往作贸易用。

明州港经济腹地自唐中期后其造纸、印刷业和种茶、制茶业的发展也很快。据《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杭州、越州、婺州的藤纸、细纸及衢州的绵纸都是可作上贡的地方土特产。越州的“剡藤”纸尤为出名。唐后期，明州、越州、杭州一带又成为竹纸的著名产区。明州港经济腹地还是唐代雕版印刷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中唐文学家元稹记述说：“杭、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sup>〔2〕</sup>。唐代佛教兴盛，明州又位近佛教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国清寺，故明、越州一带刻印出售佛经、佛像的风气亦十分兴盛。到唐朝留学、经商的日本僧人、商人在明州港启程返国时，往往带去大批经卷、佛像。由于从唐代开始“风俗贵茶”，由此种茶、制茶业逐渐遍及湖、越、明、杭、睦、婺、台等七州，并出现湖州紫笋、婺州东白、睦州鸠坑等多种名茶<sup>〔3〕</sup>。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年—824年），朝廷因国库空虚，就将两浙等产茶区的茶税增加百分之五十，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sup>〔4〕</sup>，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两浙等地产茶、销茶量之大。

由上述可见，明州港经济腹地在唐中后期已发展成为丝、瓷、纸、茶等大宗热门贸易产品的重要生产区域，这就为明州商港城市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1〕 参见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文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

〔3〕 李肇《国史补》卷下。

〔4〕 《文献通考》卷十八《榷茶》。

## 二 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畅通

明州港座落于浙江东端,在隋唐以前,因其地处偏僻,交通不畅,经济腹地被局限于甬江冲积平原及附近山麓,显得十分狭窄,其海上交通由于受到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限制,极少有远海航行。到隋唐时期,明州港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首先是隋代开通了大运河,明州港乃可通过余姚江、浙东运河同大运河连贯而衔接江、淮、京、津,成为大运河东南延伸线与东海相连的关键交接点。由于隋朝历时极短又多战争,故大运河开通的巨大经济效益要到唐代才显示出来。唐代大运河和南方河流、湖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提闽、越,七泽十藪,三江五湖,控制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sup>[1]</sup>。明州港是这个庞大水运网干线的重要一环,其经济腹地自然得到很大扩展,远远超出了唐代明州的行政辖区,除了宁绍平原和浙东丘陵区之外,杭嘉湖平原、浙中盆地及苏南等地的物资、产品也皆可利用水道通畅地运抵明州港。当时海商船舶如需转运货物到内地,亦往往不由多险滩的杭州湾登陆,而是从明州港“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sup>[2]</sup>。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观察使孟简还主持修建了浙东运河沿岸的运道塘(即沿岸石路)<sup>[3]</sup>,以便于过往船只避风停泊和拉纤,提高了浙东运河的运输能力,也进一步适应了当时明州港与杭、越州及内地之间水道运输量的增加。

随着唐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明州港的海上交通亦日

[1] 《旧唐书·霍融传》。

[2] 施宽《西溪丛语》。

[3] 陈桥驿《浙东运河的变迁》(载《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中转引自《新唐书·地理志》(百衲本)。



趋发达。据唐常暉之《舟賦》曰：唐代“大舟之用，殊于昔時；今乃守則海外，化漸無垠，浮三海以實倉廩，歷四騏以周乾坤。……穹水路以通適遠，惟大舟之用存”。唐僧人玄應《一切經音義》也記載當時已能造“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的“蒼船”。唐人所造海船不但繼承發展了前代形成的可轉向靈活駛風的斜桁偏掛縱帆和垂直懸吊軸動舵，而且船殼採用多層船板鐵釘釘合，用桐油、石灰和麻絲捻縫，並進而發明水密隔艙，使船殼的強度和抗沉性大大提高，還使海船能增加桅帆數量以加強風力推進效果。此外，唐人還發明了船舷側披水板，形如鶴翼，“行海上雖風濤怒張，而無傾到”〔1〕，能防止遇側逆風和橫向海流時的船舶橫漂。故當時唐船以船身大、容積廣、結構堅固、設備完善、抗風力強而著稱於世。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2〕，當時明州一帶是越州的一個沿海縣和海港所在地，也是越州的主要造船基地。今寧波市區曾考古發掘出唐代造船場遺址，遺址內不僅保存着成排的唐代造船工地棚舍建築的柱、樁和修造船用的桐油灰、繩索、船釘及許多木頭、木渣、加工過的碎殘船板等遺物，甚至還有一艘唐代木船〔3〕。從航海技術來說，唐代航海家們控制海船航向已從星宿定向發展到牽星過洋，尤為重要的是唐人還逐漸掌握了憑借季風加速木帆船海上航速的技術，而明州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港口常年不凍，六至十月盛行東南風和偏南風，十至翌年二月多吹西北風和偏北風，這能利用季風進行航海的古人來說，確是一個氣候條件很理想的海運到發港。唐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作為中日北線航路媒介的新羅（今朝鮮）同日本關係惡化，日本遣唐使因“新羅梗海

〔1〕 李暉《太白別經》。

〔2〕 《資治通鑑》唐紀十五。

〔3〕 林士民《明州港的造船業》，載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和寧波市文管會合編的《寧波港海外交通史論文選集》。